

李劫人“大河小说”研究综述：叙事特征、文化内涵与译介研究



胡毅, 冯智娇*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摘要: 自20世纪初至今, 李劫人及其“大河小说”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对李劫人“大河小说”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发现学界主要聚焦于其文学叙事特征、文化内涵及译介研究三个维度展开探讨。然而, 当前中国研究在译介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译本的语言转换与译介策略分析, 而对译介效果、目标语境接受度及文化信息重构的探讨相对较少。因此,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译介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以推动“大河小说”在国际语境中的传播, 并增强巴蜀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关键词: 李劫人; 大河小说; 叙事特征; 文化内涵; 译介研究

DOI: 10.57237/j.cll.2025.03.001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Li Jieren's "Great River Novel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ranslational Studies

Hu Yi, Feng Zhiji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Li Jieren and his “Great River Novel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and achieved a wealth of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Li Jieren’s Great River Novels, identifying three primary dimensions of scholarly inquiry: literary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implication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primarily concentrated on the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of translations and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while discussions on translation outcomes, acceptance in the target contex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remain relatively scarce.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could further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o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Great River Novels”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and enhance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Bashu culture.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巴蜀地域文化的文学记忆与译介传播: 以李劫人的“大河小说”英译为中心, 立项编号: WHCY2024B34;

四川省巴蜀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李劫人“大河小说”的巴蜀地域文化记忆与译介传播, 立项编号: 2024YB02;

四川省认知语言学会: 巴蜀小说《死水微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立项编号: SCRY2024GJ02;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对外传播研究专项课题: 李劫人法国文学汉译对其巴蜀文化记忆书写的影响研究, 立项编号: SC25BS032.

*通信作者: 冯智娇, zhijiaofeng@hotmail.com

收稿日期: 2025-05-15; 接受日期: 2025-08-15; 在线出版日期: 2025-10-16

<http://www.chlanglit.com>

Keywords: Li Jieren; *Great River Novels*; Narrative Features; Cultural Implications; Translation Studies

1 引言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强调了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影响力建设是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作为巴蜀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劫人的“大河小说”不仅承载了丰富的地方历史记忆，还以其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深厚的人文关怀，生动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初期川西地区的社会变迁。其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为理解巴蜀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叙事模式以及现代性探索提供了重要素材。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李劫人及其“大河小说”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要集中在其文学叙事特征、文化意涵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影响等方面。然而，相较于文学研究的广泛展开，译介研究仍显不足，尤其在跨文化传播、目标语境下的接受度及文化再现策略等方面存在较大空缺。因此，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对李劫人“大河小说”在叙事特征、文化内涵及译介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发展进行综述，旨在探讨当前研究的重点与局限，并尝试提出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以推动李劫人作品在国际语境中的传播与理解。

2 李劫人“大河小说”的叙事特征研究

李劫人“大河小说”叙事主题鲜明，情节相织交融，作品中体现出“新”也存在着“旧”。包中华认为：从“大河小说”构建的角度考虑，“大河小说”创作虽有“旧”因素，但是已经呈现出“新”面貌。李劫人在翻译法国文学的过程中，将其技艺内化成中国现代文学“新”气质和品格[1]。李劫人保留了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时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注入了心灵和理想的力量，选择非直接聚焦社会阴暗面的意图，以更独特的视角——普通人民的现实生活展现社会现实，增添了人文情怀，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流派增添了新的色彩[2]。

2.1 现实主义与人文情怀交融

李劫人的“大河小说”现实主义特征显著，或许现实主义并不适用于形容其叙事特征，但是形容李劫人却

恰到好处，其作品叙事背景大多关涉巴蜀地域的人文情怀。李劫人的“大河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事件为叙事背景讲述了当时川西地区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状态，揭示了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普通民众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冲突中的挣扎与选择，展现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及人性在这种环境下的扭曲与挣扎。其自然主义的叙事风格与法国作家“Zola”相似，郭沫若先生也称其为“中国的左拉”[3]。他结合历史回忆以及自我思考进行写作，在现实主义叙事中汇入人文情怀，将主观与客观相融。陈昉昊也提到“李劫人在历史真实，主观回忆，个人偏见与想象建构的矛盾冲突之中找寻平衡的支点，将历史的真实与虚构想象混合”[4]。而这种主观与客观的融合，使其作品达到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从而打破了现实与人文的次元壁垒，使得其文学价值更上层楼。

2.2 对家庭题材的重视

李劫人的叙事风格常被学界与巴金的作品相提并论，这不仅源于二者同为巴蜀文化的重要书写者，还因为他们均以家庭叙事为核心，借助个体家庭的变迁映射社会结构的变革。然而，在叙事方式与关注焦点上，两者展现出明显的不同。司昆仑[5]指出，巴金的小说以家庭内部矛盾为切入点，深刻剖析封建家族制度，并通过激进的现实主义批判方式，彻底否定封建礼教对个体自由与社会发展的束缚。²相比之下，李劫人的“大河小说”则具有更强的历史纵深感和社会整体性，其作品立足于宏观社会变迁。李劫人的“大河小说”通过家庭叙事呈现晚清至民国初期四川地区社会结构的转型，进而揭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不同阶层的冲突与适应[7]。

李劫人对家庭的书写不仅限于个体悲欢，而是以家庭为社会变迁的缩影，折射出国家政治、经济及文

¹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左拉之待望》中翻译为左拉，而在现代翻译中通常将 Zola 翻译为佐拉。

² 关于巴金《家》对于封建家庭的抨击也可参考刘颖对于此作品中家文化的深层分析。[6]

化层面的动荡与不安。其叙事风格兼具现实主义与历史意识,不仅展现了家庭在社会剧变中的演变,还深入探讨了社会变革对家庭伦理、亲属关系及个体价值观的深远影响。任宇欣进一步指出,李劫人通过对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生活细节及社会互动的细腻描绘,重构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使家庭叙事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文本载体[8]。相较于巴金以批判性笔触直面封建家庭制度的瓦解,李劫人更倾向于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中考察家庭与社会的互动,展现封建伦理与现代思潮交织下个体命运的变迁。

这一比较不仅凸显了李劫人家庭叙事的宏观性和历史深度,也揭示了其“大河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即通过家族叙事建构宏大的社会历史画卷,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家庭角色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视角。

2.3 现代性

研究发现,对于李劫人“大河小说”现代性的研究颇多,黄修己评价李劫人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行者”[9]。其最早一篇白话小说《儿时影》发表于1915年6月,随后在1917年前又发表多篇白话小说,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行者。李劫人的作品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念影响而痴迷于追寻历史真相[10]。一切以真为标准,根据相关的文献和资料,历史事件在他思考后进行“二创”,赋予这些作品真实性以及文学性,更加自然地将读者引入小说的叙事境界。李劫人作品中旧与新的不断碰撞,产生了独特的现代性逻辑。罗维斯提出:“李劫人的‘大河小说’不仅体现了独特的历史观念,在创作手法上也与旧小说和新文学都若即若离[11]。”这一观点表明了李劫人“大河小说”的现代性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新民主主义变革中,一些维新主义者对于西方思想具有盲目的尊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展现出当时文学现代化的“被动性”,只不过这种“被动性”在李劫人“大河小说”中较为隐蔽地展现出来[12]。陈昉昊认为李劫人通过革新传统的白话小说改制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小说[4]。而李劫人最初的作品从各方面考虑后,刘勇认为对于现代白话小说的起点的把握在于其文学内涵,并非时间顺序,所以他并未认定李劫人的创作为现代白话小说的起点[13],但是李劫人的作品中的现代性确实被学术界广泛关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劫人的“大河小说”通过历史真实与文学叙事的交融,构建出中

国现代文学中独特的现代性范式。他既保留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厚重感,又注入了心灵和理想的力量,这种创作理念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线性叙事,展现出其独特的现代性。这种“旧”与“新”融合式创作结构为当代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构中国叙事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彰显出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本土性”与“现代性”深度融合的可能。

3 大河小说中的文化内涵

李劫人“大河小说”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司昆仑这样评价他“李劫人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历史学家。”³[4]因为他写实的创作理念,所以他将一系列历史大事件通过自己的思考加之时代背景终究留下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记忆,再融入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为我们展示了当时人民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通过语言暗示,为小说融入了一层神秘色彩。

3.1 时代记忆

李劫人的“大河小说”系列以史诗笔触重构了巴蜀近代史的精神图谱,通过微观叙事呈现宏观历史变革。在《死水微澜》中,他聚焦成都北郊天回镇的日常褶皱,以市井细民的生存状态折射辛亥革命前夜的社会暗涌;至《大波》则转向历史激流,以保路运动为棱镜,透视清王朝崩溃与民国初建的剧烈嬗变;而《暴风雨前》更以思想启蒙为经纬,捕捉辛丑条约后民智觉醒的复杂图景。这三部曲构成的多维叙事,既是对巴蜀地域文化的深度勘探,更是对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学见证。吴国坤指出,李劫人在历史叙事中展现了道德良知与诗性想象的精妙平衡。他并非简单复刻史实,而是遵循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诗学理论,将客观史实与主观重构熔铸成“叙事复合体”[14]。这种创作方法论在《大波》对保路运动的书写中尤为典型:作者既严格考据历史文献,又以小说家的敏感捕捉时代情绪,通过“新奇化”的叙事策略,将经济纠纷、政治博弈与民众觉醒编织成具有史诗品格的文学记忆。这种“二次加工”并非对历史的背叛,恰是如韩素音评价的“最可靠的证明材料”[15]——他以文学想象激活了尘封的历史记忆,使巴蜀文化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

3 “Li Jieren is a far better social historian”

李劫人的历史书写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史诗性不在于宏大叙事的堆砌，而在于对历史褶皱的细腻还原。他通过地方志式的细节考据与小说家的艺术直觉，在史料地基上建造起文学纪念碑，既为巴蜀文化保存了集体记忆，也为现代历史小说开辟了“诗化真实”的新路径。这种创作智慧，恰如怀特所言，证明了历史叙事本质上是“想象性再现”的艺术，而李劫人正是以文学想象力，完成了对民族记忆的审美救赎。

3.2 巴蜀地域文化

李劫人的“大河小说”对四川方言的运用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也为四川地区的语言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李劫人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方言描述，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与人物形象。白浩也认为：李劫人的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符合当时报社文化背景，可见其文章的旧式文艺，同时也符合近代报业的风格，可显其现代性[16]。他的“大河小说”中丰富的人物对话和四川方言不仅仅展示了人物特征与地方文化。在女性的刻画中，其笔下的女性或许受到地域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有了冲破禁锢的苗头，却又被封建思想影响的矛盾状态。

3.2.1 巴蜀语言文化

李劫人“大河小说”中运用了许多巴蜀地域和时代特色的语言表达。李劫人是最早试写白话文小说新文化作家的一人，他的语言风格可谓亦俗亦雅，两者相互配合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美感[17]。他将通俗的口语化的四川方言以文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是从一个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是他从地方身份的潜意识到写实创作理念的一个转变[18]。李劫人在后期的创作中主动的使用一些民谣和传说来丰富人物特征，也为小说故事情节发展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天魔舞》中小马用“天上明亮亮，地下水幽幽。左手力大，右手让他一下”的内行歌谣来讽刺老吴是个粗人，同时也暗示了小马自己的人物性格；大波里用歌谣“星宿儿，挤眼睛”来形容夜空之美，同时也暗示一场大变动[19]。不仅如此，李劫人还通过方言来表达世俗的变迁，在《死水微澜》中，他用苏气，伸抖，这是个不安分的怪婆娘等方言词来展示了邓幺姑对于当时世俗婚姻观念的突破[20]。李劫人用雅俗共赏的语言文字，以普通民众的视角表现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精神[18]。

3.2.2 女性文化

李劫人“大河小说”在女性的刻画上也是耐人雕琢，其笔下的女性也如其小说一般，存在旧思想，却又存在新突破，他对当时女性的描写颇为细致，其笔下的女性直率刚强不受时代束缚，处于一种既封建又现代的奇妙状态之中，这或许是受到巴蜀地理位置独特性的影响。例如，在小说《死水微澜》中，邓幺姑反叛着婚姻却又自愿裹着小脚；在当时反叛婚姻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但是裹小脚却又是封建的，仿佛在冥冥之中她又想突破封建，又被封建限制着。李劫人笔下的女性大多具有这个文化特征，这个文化特征展现了新旧思想的冲突与融合。李怡认为，其文下的女性，似乎与法国自然文学主义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女性处于一种半新不旧的微妙状态，“反封建”和“反传统的”的决心和行动都不够彻底，进一步的展现了这些女性新旧思想的冲突和融合[21]。李劫人笔下的女性似乎顺应着时代的变化性，通过女性的“叛逆”展现出了时代的变迁，同时也展现出了其视角的变迁，他的视角投入到了巴蜀的民间，找到了民间女性身上的磅礴力量。彭超的研究发现李劫人以不饰之笔揭示新文化运动高居殿堂的失败性，并将其视角转向民间，寻找新兴力量，蔡大嫂便是其在民间的发现[22]。而魏颖认为李劫人在对日常生活进行叙述的同时，回避了女性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自我意识的觉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却具有超越特定时空的艺术魅力[23]。

4 译介研究

关于李劫人及其“大河小说”研究，虽然学界在文化内涵与叙事特征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在译介研究方面仍存在一定空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译介策略、方言翻译及文化传播等维度，但对译介效果、目标读者接受度以及跨文化传播的深入探讨尚显不足。

4.1 译本对比研究与翻译策略

现存的两部《死水微澜》英译本，即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译者喻璠琴与胡志挥）以及2014年由Merwin Asia出版的 *Ripples on Stagnant Water: A Novel of Sichuan in the Age of Treaty Ports*（译者Bret Sparling与殷驰），

在翻译策略和语言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陈婧(2018)对两部英译本中的方言翻译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两者皆采用标准化翻译以增强可读性,但2014年译本更倾向于非正式语言表达,以更准确地呈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及地域文化特征。相比之下,1990年译本在语言处理上更为保守,倾向于直译,从而导致部分文化内涵的流失[24]。

张蓓(2023)通过文本细读,对比了两部英译本的整体行文风格,指出2014年译本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动介入,对原作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使其更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一版本在语言表达、文化适应性及文本流畅度方面有所优化,但同时也削弱了部分原作的地域文化特色,使得译本更偏向目标语受众的接受标准[25]。这一现象呼应了Venuti(1995)提出的“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策略之争,即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译者如何在忠实再现原作文化特征与提高译文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26]。

此外,李秀(2019)在其研究中探讨了李劫人作品翻译中的现实主义风格再现问题,指出译者在面对“大河小说”中繁复的历史叙述、人物对白及方言特色时,往往倾向于采用意译或解释性翻译,以提高译文的流畅度。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本的文化陌生感,导致译本缺乏地方色彩[27]。“大河小说”在对外传播的译本中往往为了迎合读者群体而压缩了地方文化特性,但是这种方式让中国文化传播了出去,从而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

4.2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及地域文化再现

李劫人“大河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cultural-loaded words),如巴蜀方言、袍哥文化、传统习俗等,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面临挑战。王艳(2021)研究了“大河小说”译本对巴蜀地域文化的呈现方式,发现2014年译本更倾向于使用解释性翻译,并辅以注释,以帮助目标语读者理解。例如,“掌柜”一词在1990年译本中被直接译为“shopkeeper”,而2014年译本则采用“proprietor”,并在文中通过描述性语境补充其社会地位与文化含义[28]。

钟璇(2022)通过整理巴蜀文化外译相关研究,发现2010-2020年间对巴蜀文化外译的研究仍然较为传统,且多侧重于文本分析,缺乏实证研究和多模态翻译手段的探讨[29]。她指出,在李劫人“大河小说”的

翻译过程中,部分文化负载词因目标语缺乏对应表达而被省略或弱化,导致译文在文化深度上的损失。这一现象与Baker(1992)提出的“文化信息流失”(los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理论相契合,即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转移过程中,部分文化特征因不可译性或目标读者理解的限制而被简化或省略[30]。

4.3 译介效果与跨文化传播

尽管李劫人“大河小说”的英译版本在语言流畅度和可读性方面做出了调整,但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实际接受度仍值得进一步探讨。罗维斯认为,李劫人的“大河小说”在西方学术界的接受度有限,主要原因在于译本未能充分展现其历史叙事的独特性,且未能结合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进行有效的文化对接[11]。

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不仅是文本层面的转换,更涉及文化传播策略的优化。陈浩(2020)提出,李劫人大河小说的外译应更多关注目标语境下的接受机制,如结合数字人文方法,通过语料库分析和读者反馈数据研究译本的文化传播效果。此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采用更灵活的翻译策略,如注释、脚注或文化补偿策略,以提升译文的文化再现度[31]。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李劫人“大河小说”的译介研究主要集中于译本对比、文化负载词翻译及目标语境下的接受情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第一、译者主体性: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以及如何在文化转换中保持原作的地域特色。第二、跨文化接受度:通过实证研究(如读者问卷调查、译本阅读实验等)分析译本在目标语受众中的接受情况。第三、多模态翻译手段:探索结合图像、音频等手段增强译文对巴蜀文化的呈现效果,以提升跨文化传播的精准度。第四、数字人文与语料库分析:利用大规模平行语料库,对译本的语言风格、词汇变异及文化信息流失进行量化研究,以获取更客观的数据支持。

未来,李劫人“大河小说”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仍需进一步挖掘。学界应关注译介策略与目标文化接受度之间的平衡,以推动李劫人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并助力巴蜀文化走向世界。

5 结语

总体而言,中国学界对李劫人“大河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特征和文化内涵方面,而对其译介研究

相对薄弱,尤其在译介效果、目标语境下的接受度及文化再现策略等方面仍有待深入探讨。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译介策略和文本特征,如方言的处理方式、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及文本改写现象,但对于译文在目标语受众中的接受情况、文化信息的流失与重构等问题关注不足。由于巴蜀方言的独特性和文化背景的深厚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难以在语言转换的同时保留原文的文化韵味,从而影响译本对原作地域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忠实再现。李劫人“大河小说”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本,更承载了巴蜀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推动其高质量译介,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为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案例。未来的译介研究应在兼顾文本忠实性和目标语受众接受度的基础上,探索更加有效的翻译策略,以促进巴蜀文化的全球传播,并深化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李劫人大河小说的译介视角,结合跨文化传播理论、数字人文方法以及多模态翻译策略,以系统化的方式考察其在国际语境中的传播路径。具体而言,可通过译本的语料库分析、目标读者反馈调查及翻译实践对比,深入探讨译本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功能及其对原作社会历史价值的呈现。此外,研究还可关注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分析不同译本对文本风格、叙事逻辑和文化元素的重构方式,以更全面地揭示“大河小说”在全球文学传播中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包中华. 从翻译到创作论李劫人的文学自觉 [J]. 东吴学术, 2018, (04): 132-139.
<https://doi.org/10.16100/j.cnki.cn32-1815/c.2018.04.013>
- [2] 钱林森. “东方的福楼拜”与“中国的左拉”——李劫人与法国现实主义文学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1, (02): 130-140.
- [3] 郭沫若. 《郭沫若佚文集》[J]. 《中国文艺》, 1937, 1(2): 5-6.
- [4] 陈昉昊. 地方性、文本现代性与“情”: 近五年海外现代中国都市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三个路径 [J]. 上海文化, 2021, (04): 100-110.
- [5] Sikun Lun: *Fact in fiction: 1920s China and Ba Jin's Family*, Kristin Staplet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6.
- [6] 刘颖. 巴金小说《家》中的家文化深层分析 [J].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21, (10): 12-13.
- [7] 陈万芳. 李劫人“大河小说”中的四川社会历史图像 [D]. 湖北师范大学, 2020.
<https://doi.org/10.27796/d.cnki.ghbsf.2020.000194>
- [8] 任宇欣. 李劫人长篇小说中的家庭书写研究 [D]. 西华大学, 2022. <https://doi.org/10.27411/d.cnki.gscgc.2022.000596>
- [9] 黄修己主编: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第 93, 313—314 页.
- [10] 吴国坤, 胡安定. 失落的地理诗学: 李劫人的中国革命时代的成都书写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4, (05): 48-73.
<https://doi.org/10.16287/j.cnki.cn11-2589/i.2024.05.007>
- [11] 罗维斯. 李劫人的“大河小说”与中国的现代化 [J]. 当代文坛, 2021, (03): 85-91.
<https://doi.org/10.19290/j.cnki.51-1076/i.2021.03.012>
- [12] 刘永丽. 李劫人“大河小说”中的“现代” [J]. 当代文坛, 2011, (S1): 40-43.
<https://doi.org/10.19290/j.cnki.51-1076/i.2011.s1.009>
- [13] 刘勇. “起点”的文学史意义——从“第一篇”现代小说的争议谈起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2(02): 83-90. <https://doi.org/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2.009>
- [14] 吴国坤. 大鸟吃小蝇——地方记忆及对李劫人《暴风雨前》的另类读法 [J]. 现代中文学刊, 2015, (01): 76-90.
- [15] Suyin Han, “*The Crippled Tree*”, London: Triad Grafton, 1982.
- [16] 白浩. 李劫人语言的市民风 [J]. 当代文坛, 2011, (S1): 55-57. <https://doi.org/10.19290/j.cnki.51-1076/i.2011.s1.013>
- [17] 贾芹越. 李劫人小说语言风格研究 [D]. 闽南师范大学, 2024. <https://doi.org/10.27726/d.cnki.gzzsf.2024.000227>
- [18] 陈羲. 论李劫人方言写作的深层动因 [J]. 名作欣赏, 2020, (06): 57-59.
- [19] 姚建爱. 李劫人小说创作的民俗文化研究 [D]. 山西大同大学, 2024. 63-64.
<https://doi.org/10.48978/d.cnki.gckha.2024.000048>
- [20] 胡蓉. 李劫人小说中的四川方言与文化内涵——重读《死水微澜》 [J]. 钦州学院学报, 2016, 31(09): 25-29.
- [21] 李怡. 李劫人: 旧趣味通达新生活——重审关于“中国左拉”的判断 [J]. 文学评论, 2023, (03): 5-14.
- [22] 彭超. 从不同视野下的“蔡大嫂”们看女性意识变迁 [J]. 当代文坛, 2016, (03): 133-136.
<https://doi.org/10.19290/j.cnki.51-1076/i.2016.03.030>
- [23] 魏颖. 从日常生活形象看《死水微澜》的女性空间建构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5(02): 75-79.
<https://doi.org/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2.02.008>

- [24] 陈婧. 从《死水微澜》译本看文学方言的翻译 [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20(06): 100-106.
- [25] 张蓓. 译者声音与译本形变——《死水微澜》2014 年英译本研究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46(02): 119-128.
- [26] Venuti, Lawrence.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 [27] 李秀. 2019. “现实主义小说英译中的风格再现——以李劫人‘大河小说’英译本为例.” 当代翻译研究 16(02): 89-93.
- [28] 王艳. 2021. “巴蜀文化外译中的文化负载词处理——以《死水微澜》英译本为例.” 翻译与跨文化传播 12(01): 45-52.
- [29] 钟璇. 巴蜀方言文学外译与地域文化身份的构建——以《死水微澜》英译本为例 [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2, (01): 231-239. <https://doi.org/10.19954/j.cnki.lcr.2022.01.030>
- [30] Baker, Mona.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 [31] 陈浩. 2020.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补偿策略探究——以李劫人《死水微澜》英译本为例.” 外国语言与文化研究 27(04): 102-108.